

中国古代哲学的
逻辑发展

上册

冯契著

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

上 册

冯 契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沪)新登字101号

封面装帧 范一辛

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

上册

冯契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4号)

总发行所上海发行所发行 常熟第七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1.75 插页 2 字数 196,000

1983年10月第1版 1993年3月第2次印刷

印数 11,601—13,600

ISBN7-208-01602-X/B·194

定价 4.40元

目 录

绪论	1
第一节 哲学史研究的方法论	1
一、把握哲学历史发展的根据	2
二、历史的方法与逻辑的方法相结合	11
三、运用科学的比较法	20
四、站在发展的高级阶段回顾历史	27
第二节 中国传统哲学的特点	32
一、从近代哲学革命回顾传统哲学	33
二、哲学史上的认识论问题	37
三、在逻辑学和自然观上的特点	42
四、在考察人的自由问题上的特点	47
五、形成中国传统哲学特点的原因	54

第一篇 先 秦

第一章 中国古代哲学的诞生	63
第一节 原始的阴阳说与五行说	63
第二节 “古今”、“礼法”之争与“天人” 之辩的开始	71

第二章 儒、墨、道、法诸子的兴起	82
第一节 孔子的仁智统一学说	82
一、保守的政治态度和创造性的教育实践	82
二、仁与忠恕之道	85
三、认识论与伦理学的统一	89
四、“敬鬼神而远之”与“畏天命”	94
第二节 墨子以及儒墨之争	
——经验论与先验论的对立	96
一、平民的哲学家	97
二、“兼爱”与功利主义	100
三、“名实”之辩的开始	104
四、“非命”与“天志”	113
第三节 《老子》：“反者道之动”	
——辩证法否定原理的提出	118
一、“礼法”之争中的否定态度和复古主张	119
二、“天人”之辩上的“无为”	121
三、“名实”之辩上的“无名”	123
四、辩证法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	126
第四节 《孙子兵法》以及法家之初起	133
第三章 百家争鸣的高潮	144
第一节 《管子》和黄老之学	145
一、法家和黄老之学的合流	145
二、在哲学上对《老子》的改造	150
三、《管子》为“法”提供了哲学基础	156
第二节 儒法之争与孟子性善说	160

一、儒法之争与子思、孟子	160
二、“王霸”、“义利”之辩	166
三、性善说与先验主义	169
四、“养浩然之气”与天人合一论	176
五、“知言”	182
六、孟子对“性”(本质)范畴的考察	184
第三节 庄子:“万物一齐,孰短孰长”	
——相对主义反对独断论	190
一、道家学派的分化与“避世之士”庄子	190
二、具有泛神论色彩的天道观	194
三、用自然原则反对人为	199
四、以相对主义作为认识论的基础	203
五、对言、意(逻辑思维)能否把握道(宇宙 发展法则)所提出的责难	210
六、庄子的相对主义是哲学发展的一个环节	217
第四节 名家“坚白”、“同异”之辩	222
一、惠施:“合同异”	224
二、公孙龙:“离坚白”	227
三、相对主义和绝对主义的对立	230
第五节 后期墨家论名实关系	233
一、继承和发展墨子的功利主义	234
二、“以名举实”的认识论	238
三、科学的形式逻辑学说	241
四、自然观上的原子论和经验论倾向	253
第四章 先秦哲学的总结阶段	260

第一节	荀子对“天人”、“名实”之辩的总结	
	——朴素唯物主义与朴素辩证法的统一·····	260
一、	“古今”、“礼法”之争中的进步立场·····	262
二、	“明于天人之分”——天道观·····	266
三、	“明于天人之分”——社会历史观·····	273
四、	“性伪之分”与“化性起伪”·····	279
五、	“制名以指实”——关于认识过程的理论·····	285
六、	“制名”以“辨同异”——辩证法是普通 逻辑思维所固有的·····	293
七、	“符验”、“辨合”和“解蔽”——客观地 全面地看问题·····	299
八、	关于“成人”(培养理想人格)的学说·····	305
第二节	韩非：“不相容之事不两立”·····	314
一、	韩非反对“杂反之学”·····	314
二、	法治思想与历史进化观念·····	318
三、	“缘道理以从事”与“因人情”·····	323
四、	“因参验而审言辞”·····	334
第三节	《易传》：“一阴一阳之谓道”	
	——朴素的对立统一原理的确立·····	340
第四节	阴阳五行学说的发展	
	——辩证逻辑的比较法运用于具体科学·····	353
第一篇小结	·····	363

绪 论

第一节 哲学史研究的方法论

本书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来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史。在这个领域里，前辈和时贤已做了大量的工作。我只是想在他们工作的基础上，用粗线条来描绘一下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合乎逻辑地发展的轨迹。这里用的“古代”一词，是指自先秦至鸦片战争以前这一段时间。

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中国哲学的逻辑发展，以求建立科学的中国哲学史，这是一项有待于许多人共同努力的重要工作。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培养共产主义的新人，指导思想当然是科学的共产主义世界观，同时也必须继承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要善于把传统中的科学性、民主性的因素提取出来，加以发扬。哲学以理论思维的方式来掌握世界，它是时代思想的精华，也是民族传统的精华。正如恩格斯所说：“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

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理论思维的能力“必须加以发展和锻炼,而为了进行这种锻炼,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手段。”^①这里所谓“学习以往的哲学”,就是指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来研究哲学史,总结理论思维的规律性。

那么,在中国哲学史领域,如何具体地运用辩证方法呢?我以为必须特别注意以下四点要求。

一、把握哲学历史发展的根据

运用辩证的方法来研究某个领域,首先要求经过周密的调查研究,把握这个领域的根据,即把握规定着这个领域的矛盾的各个方面的基本要素。哲学发展的根据是什么呢?这就要从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互相联结来考察。

从矛盾的普遍性来说,哲学作为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同其他意识形态和科学一样,来源于人类的社会实践。社会实践(主要指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哲学的源泉。所以,我们一方面应该以阶级斗争理论作为分析历史上哲学思想的指导线索,另一方面又必须考察具体科学(首先是自然科学)

^① 《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67页,第465页。

的发展,把两者结合起来,研究哲学思想的历史演变。一个哲学家的实践活动往往是多方面的,不只是参加阶级斗争或政治活动,还研究科学、整理文献,或者还从事教育工作和文艺创作等。如果只注意他的政治态度,或者只注意他的科学研究成果,就往往不足以全面地说明他的哲学思想是怎样从社会实践中产生的。

每一种意识形态都有它相对独立的发展。每种哲学体系都是从它的先驱者留下的思想资料演变和发展而来的。但是,这些思想资料如何演变和发展,归根到底是由经济关系来决定的。恩格斯说:“经济在这里并不重新创造出任何东西,但是它决定着现有思想资料的改变和进一步发展的方式。”又说:“这一作用多半也是间接发生的,而对哲学发生最大的直接影响的,则是政治的、法律和道德的反映。”^①经济关系、阶级关系决定着哲学的发展,但这种决定作用通常是通过中间环节即政治思想(以及伦理思想)来实现的。同时,哲学与科学有密切的联系。哲学有它的自然科学基础。恩格斯说:“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②因此,我们又

① 《恩格斯致康·施米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85-486页。

②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同上书,第224页。

必须考察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关系、哲学斗争和科学反对宗教迷信斗争的关系。政治思想斗争和科学反对迷信的斗争是推动哲学前进的两条腿，这两条腿立在同一个基础上，统一于社会实践。对此，我们不能偏废。这是一个基本的观点。

但这只是一般原理，对任何时代、任何国家的哲学都适用。我们在这里着重研究的是中国哲学各个历史阶段的发展根据。

中国哲学史不同于欧洲哲学史，中国古代哲学史也不同于近代哲学史。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阶级矛盾，反映到意识形态，有不同的政治思想斗争。各时代的重大政治思想斗争对哲学的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这都需要具体地加以研究。以春秋战国来说，“古今”、“礼法”之争反映了地主阶级革命时代的社会变革，给哲学以深刻的影响。诸子蜂起，从不同的阶级立场出发，对这一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进行了哲学的论证。如孔子、老子用唯心论来为保守复古的政治主张辩护；而墨家、法家则用唯物论来反对复古主义。到了近代，人民大众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历次重大政治思想斗争是围绕着“古今”、“中西”之争而展开的。这一论争的实质，就是如何向西方学习，并对自己的传统进行分析批判，以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找到民族解放的途径。而“古今”、“中西”之争也确实制约

着近代哲学的发展。从春秋战国和近代两个革命时代来看，政治思想斗争制约着哲学斗争，转过来哲学革命又作了政治变革的先导，这种相互作用是非常明显的。但就在这样的时代，我们也不能忽视科学反对宗教迷信的斗争。例如墨家、荀子的朴素唯物主义形态是与古代的自然科学密切联系着的，严复的进化论思想是建立在近代西方自然科学的基础上的。

然而，秦汉至鸦片战争前哲学发展的情况，同先秦和近代这样的革命时代又有所不同。地主和农民的矛盾是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农民阶级用实际行动来反对封建等级制度，与封建主义的“政权、族权、神权、夫权”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意识形态方面，表现为农民要求平等、平均的思想同封建等级思想的对立，这当然是两种世界观的斗争。农民阶级的武器的批判，往往能深刻地揭露当时官方哲学的弊病，从而迫使继起的封建王朝改换统治思想的形态，这当然影响着哲学的演变。但农民阶级不是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不可能建立新的生产方式，因而不可能象无产阶级那样建立科学的哲学体系。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并不能归结为农民反对地主的阶级斗争的反映；哲学斗争主要是在地主阶级内部进行的，如王充反对董仲舒儒学唯心主义的斗争，范缜、张载反对

佛学唯心主义的斗争，王夫之、戴震反对理学唯心主义的斗争等。但在地主阶级内部，不可能有从根本上反对封建主义的政治思想。因此，仅仅用地主阶级的革新派反对顽固派，或中小地主反对大地主的政治斗争来解释哲学上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也是缺乏说服力的。事实上，有些唯物主义者，如裴颢，却是门阀士族的代表；有些唯心主义者，如慧能，却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了庶族地主的要求。韩愈和柳宗元是朋友，但一个是唯心论者，一个是唯物论者，难道能因此便说他们之间存在着革新派与顽固派（甚至是法家与儒家）的斗争吗？当然不能。

那么，封建社会哲学发展的根据是什么呢？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推动哲学前进的，首先是科学和农业、手工业生产的发展（而物质生产的主体是农民和手工业工人）。王充、柳宗元等人都很关心物质生产，注意吸取自然科学的成就，他们的唯物主义都是与科学反对迷信的斗争分不开的。如王充反对董仲舒唯心论的斗争，同时也是科学反对谶纬神学的斗争的一部分。当然，由于这些唯物主义哲学家大多（并非全部）属于地主阶级的中下层，他们对豪强大地主的反动统治和土地兼并有所不满，对贫苦人民有所同情，这也是促使他们敢于面对现实而倾向唯物主义的一个重要因素。但这种不满和同情通常不会发展到反对封建主义的地

步,相反,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他们的唯物主义与其阶级立场是有着矛盾的。所以,归根到底,首先是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了科学反对宗教迷信的斗争,其次是社会矛盾促进了地主阶级内部的政治思想斗争。将二者结合起来考察,我们就可以把握中国封建社会中哲学发展的根据。

总之,社会实践是哲学发展的源泉,劳动人民和革命阶级是社会实践的主体。我们用这样的观点来考察中国哲学发展的历史根据,就既要把握反映一定时代的经济关系、阶级关系的重大的政治思想斗争,又要把握反映一定时代的社会生产力的自然科学的发展及科学反对宗教迷信的斗争,并且必须把两方面结合起来,进行具体的历史的分析。以上是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唯物史观的普遍原理来看哲学的发展的。

但是,哲学还有它本身的特殊矛盾,有不同于艺术、道德、宗教等意识形态的地方,有不同于其他科学的地方。不研究哲学的特殊矛盾,就不能把握哲学发展的特殊规律。全部哲学的根本问题是思维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界的关系问题。恩格斯说:“什么是本原的,是精神,还是自然界?……哲学家依照他们如何回答这个问题而分成了两大阵营。凡是断定精神对自然界说来是本原的,从而归根到底以某种方式承认创世说的人……,组成唯心主义阵营。凡是认为自然界是本原

的，则属于唯物主义的各种学派。”^①就中国哲学史来说，在天道观上，首先是争论世界统一原理的问题，即世界统一于物质还是统一于精神？物质和精神哪个是第一性的？这个争论表现在认识论和逻辑学上，就是知识和逻辑的来源问题：知识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逻辑是概念的先天结构，还是在现实世界中有其客观基础？在天道观上的争论还有第二方面，就是关于世界发展原理的问题，即世界（包括自然界和精神）是发展的，还是不变的？世界的运动、变化、发展是由自身矛盾引起的，还是由外力推动的？这就是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对立。这个对立在认识论上就表现为：把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了解为变化发展的过程，即由不知到知、由知之不多到知之甚多的过程，这是辩证法的观点；把思维与存在割裂开来就会引导到不可知论；而把思维与存在的统一看成是一次完成的，直接同一的，就是形而上学的见解。在逻辑学上，形而上学以为范畴是固定不变的，辩证法以为范畴是灵活的、能动的，整个逻辑是从前进着的各种对立的范畴中发展起来的。

把全部哲学的根本问题概括为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对哲学发展史的总结。这一根本问题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表现。我们研究中国哲学

^①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0页。

史就必须注意这一根本问题在中国历史各阶段是怎样表现的。以先秦来说，“天人”之辩与“名实”之辩是哲学斗争的中心。“天人”之辩主要是天道观和人道观上的争论，“名实”之辩主要是认识论和逻辑学上的争论。这两个问题由荀子作了总结，但以后仍以不同的形式继续争论着。还有“道”与“物”的关系问题，先秦也已经提出，后来发展为“有无(动静)”、“理气(道器)”的争论。到了魏晋，“有无”之辩成了中心；在宋明，“理气”之辩成为天道观上首要的问题。这说明天道观上的斗争在不同的时代变换着形式。在认识论上也是如此，除“名实”之辩外，“形神”、“心物(知行)”之辩在先秦时也已提出。到汉以后，由于反对谶纬神学，形神关系问题就突出起来。在佛教盛行后，为了从认识论上驳倒佛教，“心物(知行)”之辩成了中心问题。可见在认识论上，哲学根本问题的表现形式在各个时代也是不同的。

列宁说过，思维和存在的关系客观上包括三项：一、自然界即物质世界，二、主观精神即人的头脑，三、自然界在人脑中反映的形式即概念、范畴、规律等。^①因此，在天道观上就有天人、理气等问题的争论。在认识论上就有形神、名实等各个方面的争论。而总括起来则是物(气)、心、道(理)三者的关系。程朱讲“理在气先”，陆王说“天下无心外之物”，都以精神为世界的

① 参见列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94页。

本原,属于唯心主义阵营。王夫之说:“盖言心、言性、言天、言理,俱必在气上说,若无气处,则俱无也。”(《读四书大全说》)他以为世界统一于气,这是鲜明的唯物主义观点。在宋明时期,物质和精神哪个是第一性的问题,是通过“理气”、“心物”之辩展开的。

把思维和存在的同一作为一个辩证的发展过程来看,其中包括感性与理性、绝对与相对、客观规律性与主观能动性这些认识过程的必要环节。这些环节也构成矛盾,在一定条件下也成为哲学争论的重要问题。同时,在争论上述问题时,哲学家都把逻辑范畴作为工具,以一定的方式来论证自己的学说并驳斥别人。这样,围绕着逻辑范畴和逻辑方法,又引起了新的争论。先秦名家的“坚白”、“同异”之辩,董仲舒与王充的“或使”、“莫为”之争,还有决定论与非决定论的争论等,就是和逻辑范畴(“类”、“故”、“理”)相联系的争论,都是从属于哲学根本问题的争论。以上说明,哲学的根本问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并和其他从属的问题相联系,必须具体地考察。

综上所述,一方面,哲学和其他科学、其他意识形态具有共同的普遍的根据,我们必须考察反映一定时代的经济关系、阶级关系的重大的政治思想斗争以及反映一定时代生产力的发展的科学反对宗教迷信的斗争;另一方面,哲学发展还有其不同于其他科学、其他